

花木生产与园林营造：清末广州花地的生产性景观及其公共化

Floral Production and Garden Construction: The Productive Landscape and Its Public Transformation in Canton Fa-t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张欣 彭长歆*

ZHANG Xin, PENG Changxi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二维历史图像三维重建的清末岭南私园空间形态与构成规律研究”(编号：51978271)

摘要

清末广州花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贸易史、植物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十三行外贸时期，作为广州观赏植物的培育与产销基地，花地是清政府特许西方人可以游憩的地方之一，也是西方植物学家获取中国植物样本的主要来源地。以现状为基础，综合应用文献资料与历史地图，对比考证花地的河涌分布，复原清末花地园圃的历史空间格局，并进一步梳理了花地花木培育、销售等生产性景观的形成，以及私园化、公共化的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在繁荣的中西贸易与园事活动推动下，清末广州花地形成了以河涌为地理基础，以花圩为展销地，数十处苗圃花园集合的独特生产性景观。中西人士频繁开展的赏游活动推动了花地的私园营造与公共化，促使园林成为公共活动、文化和知识生产的主要空间场所。

Abstract

Fa-ti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trade, and botan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Canton. As a center for cultivating and producing ornamental plants in Guangzhou throughout the thirteen-hong trade period, Fa-ti was one of the select locations the Qing government allowed Westerners to visit. It also served as a principal source of Chinese plant specimens for Western botanists. This study thoroughly examines historical texts and maps to analyze and corroborate the historical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Fa-ti's river channels. It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garden layout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lucida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landscapes in Fa-ti, such as the cultivation and marketing of flowers and trees, alongside the trends toward garden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iz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thriving Sino-Western trade and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fostered a distinctive and productive landscape in Fa-ti, with the river serving as the geographical foundation and flower polders acting as exhibition and sales venues. Numerous nursery gardens emerged in Fa-ti during this period, creating a dynamic space where Chinese and Westerners' frequent interactions advanced the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ization of gardens. Consequently, these gardens transformed into significant venues for public events, cultural engagement, and intellectual endeavours.

文章亮点

1) 花地园圃提供了一个观察花木培育、生产、销售、展示及赏玩在内的中国古代园事运作的独特视角；2) 清末广州花地形成以花木为载体，整合生产、销售、研发、鉴赏及游览为一体，具有公共属性的复合型农业系统。

关键词

中国园林史；岭南园林；广州十三行；花地；生产性景观

Keywords

Chinese garden history; Lingnan Garden; Thirteen Hongs of Canton; Fa-ti; Productive landscape

收稿日期：2022-09-07

修回日期：2023-05-20

花地，旧称花埭，又称花田，位于广州珠江西南岸，与西关、河南隔江相对，自古以来便是广州重要的花木培育地和传统花卉贸易市场。《嘉庆一统志·广州府二》载：“花田地名在广州西南郊，俗称花地，平田弥望，皆种素馨花，相传南汉宫人皆葬于此。”明代万历时花地已成“有花园楼台数十，栽花木为业”和“海色四周无税地，香浓百亩有花田”^[1]的专业花木产区。清末苏州文人沈复曾来花地，曾写“渡名花地，花木甚繁。余自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2]显见花地花木种类之繁多。除花田弥望外，花地因滨临白鹅潭，水系丰富，风景秀美，素有造园传统，南汉时为皇家寺院宝光寺所在地；宋以降，又以“大通烟雨”^①胜景著称于世。

在长期的发展中，花地造园以花田、苗圃为基础，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园林类型。为区别起见，花地园林以“园圃”称之似乎最为合适。其形式介于园、圃之间，造园工匠兼有花田、林榭之特色。更为特别的是，因花木展示、销售的需要，花地园圃大多对外开放，在“一口通商”时期，更因清政府限制西人活动、准游花地的政策，为西方商人所流连。花地花园的形象也通过外销画和各种文字记载不断流入西方（花地西译为 Fa-ti 或 Fa-tee）。与此同时，因种植花卉品种繁多，花地成为 18—19 世纪西方植物学家获取中国植物样本的主要来源地。花地为推动中国园林艺术的西渐，以及现代植物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3]。

花地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古代园事运作的独特视角。长期以来，中国园林史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历史名园的营造，以及以造园者为主体的历史，而花木培育、生产、销售、展示及赏玩在内的其他园事活动被忽略，园林的公共意义更无从谈起。通过对花地园圃的考察，或能弥补欠缺少许。另外，花地作为西方观察、采集和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场所，其植物种类和园艺是西方植物学家的考察重点，对清末花地开展研究也有助于丰富中西方植物交流史研究。

1 花田与灌溉

历史上花地河涌密布，为花木种植提供了优越的灌溉条件。因农业生产灌溉需要，古人壅土为堰，种植果蔬并开垦水渠，花地逐渐形成水网与田地交织的农业生产景观。虽然花地在南汉时期已广植素馨花 *Jasminum grandiflorum*，但其真正成为广州花木农业生产区却在明清两代。早期广州花木种植及销售尚在城西一带。明以降，广州西关开市，包括“丛桂里”（今从桂路附近）在内的西濠西岸及下西关涌两岸被占用，逐渐形成十八甫西关商业区，广州花田便由西关丛桂里迁至花地^[4]。两地有着相似的土壤结构，均由珠江泥沙冲积而成。但与广州城西一带相比，花地充足的土地资源与优良的水网条件更利于规模化的农业生产。

花地河涌纵横交错，承担着花卉灌溉和运输的功能。通过历史地图、文献资料分析和现场勘察寻访，结合 1942 年的《广州市地图》（图 1）可推测出清末民初时期的花地水

系分布状况。花地水系以花地河为主脉，并联主、次河涌。其中主河涌包括下市涌、中市涌、大策涌、涌岸街等，形成大湾如腰带状，统称英护涌（又名腰带水）^[5]。英护涌宽约 3~4 m，两侧还设有宽 1~2 m 的步道，可通舟楫及陆上交通。而下市涌、大策涌、茶滘涌等与花地河的相接处均设有闸道，以便花农调整河涌水位以满足种植或排水防洪等需要。在主干水网之间，小涌和荷塘密集分布，形态各异且富有变化，相互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花地水系，营造了兼备农业生产与园林营造的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花木栽培及耕作技术在明清岭南已更为精细。在拍摄于 1860 年代的一幅华南地区花圃图像中可见（图 2），围绕画面中央的水渠两侧，土地被整齐地划分成平行的垄带，并以垄沟相隔，每条垄上行距整齐地种植着果树或花木，水塘中种植着王莲 *Victoria amazonica*，水渠尽头还种植着一些棕榈科植物。有理由相信，花地的花木种植呈现出相似的耕作景观，由于良好的管理和优美的田园风光而具备游览



图 1 《广州市地图》局部（1942 年）
Fig.1 Map of Canton, partial(1942)



图 2 华南地区的一处花园荷塘
Fig.2 A garden of lotus ponds in Southern China

①花地由冲沙堆积而成，向上连接大通烟雨井和周边河涌，形成了导热性好的地下热环境。每逢土地上下温差较大，连接地下冲沙与地面的烟雨井井口便会出现烟雨弥漫的效果。



图3 清末花地园圃分布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gardens at Fa-t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观赏的可能,并成为“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向西方人开放花地的政策前提。

2 花木生产、销售及其公共化

据记载,清末花地经营园圃业者及大小园林有数十家。本文基于花地现状,通过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访问,结合当地文史专家谢璋的描述^[6],初步还原清末花地园圃的空间分布情况(图3)。总体上,花地园圃依水而建,已统计的39处园圃中有35处沿河涌分布(图4)。从功能来看,花地园圃大致有3种类型,一类单纯生产,通过花商销售花木产品,一般规模较小,分布在花地腹地;一类兼具生产与展销功能,主要分布在花地河沿岸;一类兼具生产与接待等功能,有私园化倾向。

2.1 园圃与花木生产

花地园圃均具花木种植的功能。有18处生产性园圃专门种植各类蒔花和阳桃 *Averrhoa carambola* 等特色植物,其中清平园、寿春、余庆、万生园等以栽种蒔花为主,同乐园和万合园以培育阳桃为特色。这类小型园圃主要集中在花地策头村及其南侧,这里远离花地河,但小河涌密布,花农引水灌溉花田,并依托水系将花木等

产品船运至花市出售。

兼具展销功能的园圃分布在花地河东岸。明清以来花地河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运输线路,为沿岸园圃展销花木提供了便利(图5)。相较于花地腹地的生产性园圃,沿花地河建设的园圃面积更大,可满足种植、培育、展览和销售等多种功能需求。如留芳园以牡丹 *Paeonia × suffruticosa* 闻名广州城^[7](图6);醉观园即今醉观公园的前身。这类园圃十分重视特殊花木的培育,花农根据多年的培育经验将花木设计为各种造型。如翠香园园主陆学明擅长岭南盆栽;茂林园园主则以“微型盆栽”为特色吸引买家。清代诗人张维屏曾写“花地花农花样巧”^[8],赞美花农在培育花卉植物的奇思妙想,由此可见花农培育植物和盆景的高超技术。

花地园圃业者通常将花木盆景等培育成果整齐排列,便于游客在游赏花园期间选购。美国医学传教士波尔(Benjamin Lincoln Ball, 1820—1859)在1848年10月8日曾来花地游玩,他写道“花园面积很大……一排排的陶器花瓶里盛放着各种修剪得当的植物,小路边上还有灌木”^[9]。花木展览空间的设计多为线性,花卉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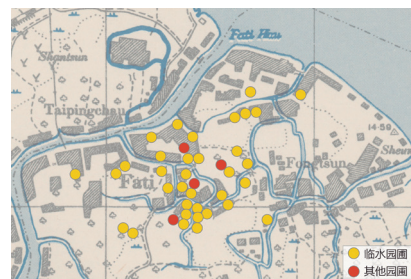


图4 花地河涌与园圃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river and garden in Fa-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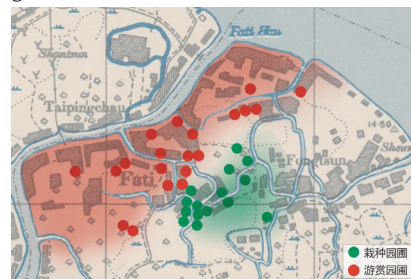


图5 花地游赏与栽种园圃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map of pleasure and planting gardens in Fa-ti

匀整齐排列在小路两侧且富有层次,近道路处摆放着矮小的盆栽,外侧则是修剪好的花木盆景;一般入口处设有简易的门坊,上有诸如“花园魁首”之类的题额(图7),部分还设有小亭用于简单的休息和观赏。花卉的直线形展示方式具有强烈的秩序性和稳定性,低矮盆栽与较高灌木等花卉展品整齐摆放,形成主次和谐的展示效果,说明清代花地园圃经营者有意识地设计园林展示空间,结合园林构筑物 and 游径充分展示花木特色,以利销售。

少量花地园圃承担接待、种养结合或禅修等多种特殊功能。翠林园(图8)以种植牡丹出名,清末广州文人常据此雅集。诗人张维屏以“天香原自贵,不必问沉香”^[10]诗句赞扬翠林园中馥郁芬芳的牡丹。该园也是广州城卸任官员的暂住地,清代来广上任的官员往往沿着小北江乘船南下至花地,与居住在此的卸任官员办理移交手续。又如建于民国初年的兰圃园是佛教女众修道之所,园中遍植米仔兰 *Aglaia odorata* 和兰花 *Cymbidium* spp.,十分清雅。由此可见,花地园圃除具备培植花木和居住的作用外,也承担迎接宾客、谈禅修养等多种功能,展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2.2 花圩和花局

“圩”即市集，花地古花圩始于明而盛于清，至清代已形成固定的花木交易地点。花地花圩位于观音庙前一片砌白麻石板的广场^[6]。张维屏曾写“花市栅头花聚处，斑斓五色各盈筐”^[11]，可见花市位于策头村附近。结合谢璋在清代花地园林示意图中标出的“花圩”位置^[7]，可推测花市位于花地大策直街和东濠北路附近（图9）。

作为花地最大的花木销售市场，花圩的花木贸易十分繁荣。花农将在小型园圃中培育的花卉进行加工，收集并到花市上贩卖（图10）。大批花卉被运至广州城内销售，张维屏对此景象曾大为赞叹，诗云：“花市朝朝水一方，目迷五色灿成行。筠篮卖入重城去，分作千家绣阁香。”^[12]除了销售给花商外，园主专门遣人将菊、兰、牡丹等各类蒔花送往爱花的富贵人家。清代画家谢兰生的日记中便有花埭老云、判春园和静香堂主人等送花卉到其它院的记载^[13]。多样的花卉品种和便捷的水路运输使花地花卉贸易更加兴盛，花地被称为“岭南第一花乡”。

随着花卉贸易的繁盛，花地还出现了具有联谊、赛会性质的花局。“局”在粤语中有自我组织、会集同道之意，而花局因花而设，又称“摆花局”“斗花局”，炫耀、竞争之意更浓。作为一种特殊的花卉展销活动，花局往往于每月神诞日如正月十五、二月二日、三月北帝诞等，由留芳园、醉观园、纫香园、群芳园、新长春、翠林园、余香圃和合记等八大园圃轮流举办^[6]。花局的展览空间设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每次花局园主赋予不同的主题，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与此同时，园圃主人还纷纷建设楼榭，为游赏和购买花卉提供展示空间。美国医学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曾记载：“它以前完全由花果园组成，但现在正在迅速建设中。”^[14]前述翠林园即属此类。花局的举办扩大了花地园圃的影响力，激发园圃之间花卉培育、生产和品位的良性竞争，进一步推动清末岭南花木种植技艺与消费市场的发展。

3 花地的私园营造与文化生产

花地优美的自然景观与农业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其中不乏官商士绅等社会上层人士。随着同文行潘有为在花地策溪村购地建园，广州绅商纷纷效仿。著名园林包括伍

氏馥荫园、听松园、杏林庄、康园等，推动了花地的文化生产。

3.1 私园营造

行商中最早有同文行潘氏来花地建园，后有怡和行伍氏继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潘有为从京中返回广州后，在花地策头村建东园，一为侍奉母亲，二为寄寓情怀。不同于普通的宅地园林，东园尤以花木胜。因兼具行商园宅和花卉种植及贸易的功能，东园中遍植水松 *Glyptostrobus pensilis*、柏木 *Cupressus funebris*、木棉 *Bombax ceiba* 等植物，四季林木葱郁，时花如菊花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木樨 *Osmanthus fragrans*、金铃花 *Abutilon pictum*、丁香 *Syzygium aromaticum* 等依时盛放。1846年潘家出售东园，北部主景区被辟为群芳园，南部宅院区由怡和行伍氏购入并进行改建，易名馥荫园，又称福荫园^[15]。馥荫园的改建与拓建以服务伍氏奢华生活及接待宾客为主要目的，园林布局适宜公共游览，而室内则中西交汇，为西方人来粤必游之地。

一些私园如杏林庄则将花木培育与个人赏玩结合，形成新的园林形态。杏林庄由香山人邓大林于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所筑，位于花地大通寺旁。邓大林字卓茂，号荫泉，宣统年间《番禺县续志》称其“善炼药，园名杏林，本取董奉丹药济人之意，实未有杏也”^[16]。作为传统雅士，邓大林不仅悬壶济世，且好林泉花木。其园地虽不大，但幽深雅洁，不设藩垣；园内八景——竹亭烟雨、通津晓渡、蕉林夜雨、荷池赏夏、板桥风柳、隔岸钟声、桂径通潮、梅窗咏雪，巧借大通寺钟声、溪边渡头及潮通珠江等花地传统人文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典园林对意境的追求。

与杏林庄一河之隔的听松园是张维屏暮年养老之所。因曾在潘氏东园长居9年，张维屏十分喜爱花地的自然、人文之美。1847年春，次子张祥瀛在花地上市涌北侧（今松基直街旁）建园供其养老，因园中松风阵阵，取名“听松园”。从张维屏诗句“五亩烟波三亩屋，留将二亩好栽花”^[17]中可见，园林中一半为池塘，围绕池塘建有海天阁、松心草堂、听松庐等主体建筑，另外设有花木培育种植的场地。听松园深受张维屏的喜爱，他曾在《听松园有序》《园中杂咏》《海天阁》等诗中，详细描写水榭歌台、楼阁堂轩及松树、红棉等园景。



图6 花地留芳园
Fig.6 Liufang Garden in Fa-ti



图7 花园内部花卉展示和“花园魁首”牌坊
Fig.7 Flower show in the garden and the 'Huayuankuishou' archway



图8 花地翠林园
Fig.8 Cuilin Garden in Fa-ti

3.2 游园与雅集

与花圃等生产性园林不同,私园园主通常也是文化艺术的赞助人,十分乐意举办文人雅集。其中有记载的花地雅集包括曲水流觞、品茗赏花、吟诗作曲等。杏林庄自建成以来便是文人雅集和宴会之地。诗人张维屏、学者陈澧、黄培芳等人结为“杏林庄诗社”,所著诗文结集包括《杏林庄竹亭记》《春日游杏林庄五首》《题杏林庄八景》《观杏林庄图跋》等,提高了杏林庄为基础的园林文化影响力。张维屏十分喜爱听松园,有关该园的诗歌达23首。《松心草堂》等诗文记载了园主宴请宾客和举办文人雅集等活动,其中花筒、爆火等戏剧表演引得周围居民爬树观看。

作为花地著名行商花园,潘氏东园及其后伍氏馥荫园具有空间延续与递进关系,但两者在文化生产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18]。东园园主潘有为以文人自居,频繁雅集,聚集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在东园中吟诗作画,创作了大量诗歌、文集,使东园成为清末广州文化生产的空间。而随后馥荫园因承担外贸接待的功能,各类西方人也纷纷来园赏玩,并通过外销画家定制馥荫园的景物画作。自摄影术传入后,更有多位中外摄影师来园拍摄。外销画、摄影及铜版画等各类图像作品将馥荫园的视觉形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世界传播,成为馥荫园不同于东园时期的重要文化输出。

游园和雅集同时激发了花地园圃经营者的艺术审美和鉴赏能力。受文人建园并举办郊游修禊活动的影响,花地园圃主人们纷纷效仿文人私园,在园圃中修筑游赏建筑吸引游客。如纫香园园主、顺德人欧全在栽花之余颇风雅,热衷与诗人词客交往。1885年元宵他拟设百花诗坛,请寓居于此的广东德庆书生梁修颂咏园中100多种花木,使纫香园声名倍增。梁修将诗文汇编为《花埭杂咏百首并序》,流传至今^[19]。花地园主的文化水平和审美意趣不断提升,促进了花地园圃中花木赏玩、诗词鉴赏和弹琴作画等多种游赏和雅集活动的举办,极大地丰富了花地的园事活动,使花地成为清末广州的重要文化空间。

4 花地植物研究与知识生产

花地园圃众多、植物种类丰富,受到18—19世纪来华的欧洲研究者的青睐。该时期西方博物学家已形成了从当地市场寻求物种的经验性认知,一本旅行博物学家的手册直接强调“必须经常拜访和搜寻当地市场”^[20]。花地因此成为来华博物学研究者最重要的田野工作场地。美国植物学家蒂法尼(Osmond Tiffany, 1823—1895)、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以及各洋行大班及职员等纷纷来花地花市搜集植物,进一步研究并将植物活株、标本、植物图解和种子等运回其国内,英国丘园(Kew Garden)内相当一部分植物是从中国运输而来。在尝试带回活体样本的同时,西方研究者还训练中国画匠按照西方近代植物学方法对植物样本进行绘画,留下了大量中国植物的

图谱。花地成为18—19世纪来华西方植物学家的重点研究场所。

西方人通过引种、改良花地植物,丰富了欧洲植物培育品种。欧洲原产蔷薇 *Rosa* spp. 香味宜人,但是花形矮小且多刺,花瓣层次单调,一年只开一次花。18、19世纪之交,欧洲人从广州苗圃先后起运了“中国四大名种”月季 *Rosa chinensis*: 植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Peter Osbeck, 1723—1805)于1752年将月月粉‘Old blush’运回瑞典,该花具有耐寒、重复开花、株型整齐等特点^[21]; 1789年斯氏中国朱红(Slater's Crimson China)被运至欧洲,花朵易存活且不易流失;1809年东印度公司船东亚伯拉罕·休姆(Sir Abraham Hume, 1749—1838)由广州花地苗圃购入休氏粉晕香水月季(Hume's Blush Tea-scented China)带回英国^[22]; 1824年黄色茶香月季(Park's Yellow Tea-scented China)被英国园艺师约翰·帕克斯(John Dampier Parks, 1792—1866)购入,该花具有花朵大、耐寒且在温室中生长茂盛等特点^[23]。英国园艺师李凡斯通(John Livingstone, 1770—1829)来华考察后记载:“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广州花地的花园来准确了解中国植物状况……此地每月准许参观三次^[24]”。上述从花地等中国苗圃带往欧洲的四大古老月季品种,奠定了现代月季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西方人还十分留意花地行商花园中的景园艺术。行商花园在营造时广泛采用本地物种,并注重食用果树、遮阳乔木与观赏花木的结合。英国博物学家福芎(Robert Fortune, 1812—1880)1857年到访花地馥荫园时发现,园中植物包含有许多为英格兰所熟悉的华南地区的优良标本,例如大花蕙兰 *Cymbidium hybrid*、木樨、柑橘 *Citrus reticulata*、玫瑰 *Rosa rugosa*、山茶 *Camellia japonica*、玉兰 *Yulania denudata* 等,以及大量的盆景树^[25]。英国人十分渴望牡丹这种温带植物,他们在私园中漫步商谈时会询问培育牡丹的方法。为了更顺利从中国运走植物,西方人也带来一些植物用来交换中国品种,如商人托马斯·比尔(Thomas Beale, 1775—1842)就曾把好几种玉兰分赠广州的中国商人^[26]。光绪年间广州已经常见西方花木,潘珍堂在《广州灯夕词》诗注云:“近来外洋花木入中愈多,园林处处皆是。”^①可见清末中西方植物交流已渗透到花田苗圃的植物种类中。

花地花农制作盆景的技术十分精巧,西方人对此大为惊叹。作为中国传统园艺,盆景(西译 Dwarf Potted Trees)在园林植物造景中频繁应用,迎合了中国的传统艺术审美。19世纪20年代,李凡斯通在花地小型花圃游玩期间注意到配景植物^[24],并详细介绍了关于微缩盆景及植物矮化技术的操作方法,其中植物包括香橙 *Citrus × junos*、桃 *Prunus persica*、阳桃、葡萄 *Vitis vinifera* 等^[27]。著名同文行行商潘有度向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赠送过一株树龄极老的盆栽矮树,他

①来自陈澧、金锡龄的《学海堂四集·卷28》,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图9 花地花圩和花局分布图
Fig.9 Distribution of flower polders and flower bureaus in Fa-ti



图10 观音庙前花圩 (1902 年)
Fig.10 Flower polders in front of Guanyin Temple (1902)



图11 花地花园中微缩的花木盆景
Fig.11 China-Trained Bamboos of Gardens in the Fati, Canton

称：“这一盆栽献给女王，以便于她能观察中国人能将森林中最高大的树种矮化成盆中美景的特殊艺术。”^[28]虽然并不认同中国传统园艺对树木的加工，奥地利女探险家费弗尔 (Ida Laura Pfeiffer, 1797—1858) 也对馥荫园中的盆景运用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人十分擅长缩微的艺术，……这些盆景树木在花园中随处可见，……最值得留意的是那细小枝头上满载的果实。”^[29]矮化盆景技术是长期研究和实践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园艺师引以为傲的技艺 (图 11)。

西方人还注意到花地独特的花卉储存技术。花地培育出的优良花卉通过水路运往广州各地，为方便储存和保鲜，花商们采用一种独特的包装形式进行储存，西方植物学家蒂法尼记录如下：“如果上船，把小尺寸的桔子树放进装满肥沃泥土的箱子里，箱子的顶部做成屋顶形状，可以随意打开和关闭。在这个盖子里……珍珠牡蛎壳薄片代替玻璃……能为植物提供光线。”^[30]这种巧妙的设计便于花卉的储存和运输，也能保证植物在极端天气下自然生长。

5 结语

总而言之，凭借良好的土壤、密布的河涌、便捷的灌溉及水运条件，花木种植园主在花地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系统，并通过花圩、花局等花木贸易及展销系统，推进清末广州花木农业的良性发展。更因“一口通商”清政府准游花地的政策，以及广州本地绅商阶层的推动作用，西方人游园和文人造园活动不断增加，花地迅速从单纯的花木生产地上升为以花木为载体，整合生产、销售、研发、鉴赏及游览为一体的复合型农业系统。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花地逐渐超脱其早期的花木培育及生产功能，呈现出公共性，至少表现在 3 个方面：1) 作为公共活动的空间。在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广州市民以及西方商人频繁开展的游览活动中，清末花地构建了雅俗共赏、兼及天下的风情与景致，以及以园事为核心的公共活动场所。如果没有后来西方公共园林空间的进入，清末广州或能在公园的建构上发展出另一种路径。2) 作为文化生产的

空间。在对花地的游览中，广州文人士大夫与西方游客以各自的方式输出文化产品。前者以传统知识精英为代表，借文字这种相对隐秘的方式传播观念和意识形态，文化受众限于识字的上层社会；而後者的文化输出基于外销画家、中西摄影师大量记录、制作的访客视角下的园林图景，以公共视觉产品的形式快速传播。3) 作为知识生产的空间。西方博物学家及植物学家对花地苗木的种类、栽培及园艺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并据此产生有关华南植物栽培与园艺的知识系统。从 19 世纪俄国汉学家布雷特施奈德 (Emil V. Bretschneider, 1833—1901) 有关欧洲人对中国植物研究的著述^[31]中可以发现，花地是 18—19 世纪近代植物学研究的重要空间节点。将花地置于世界植物交流的背景下去考察，更能反映其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注：图1、3~5、9依据《广州市地图》(藏于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局部，1942 年) 改绘；图2藏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图6~7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图8藏于美国保罗·盖蒂博物馆；图10~11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参考文献：

- [1] 郭渠. 岭南名胜录 [M]// 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 (5). [出版地不详]: [出版社不详], 1976: 91.
- [2] 沈复. 浪游记快 [M]// 沈复. 浮生六记.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 111-112.
- [3] 彭长歆. 中国近代公园之始——广州十三行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 [J]. 中国园林, 2014, 30 (5): 108-114.
- [4] 曾昭璇. 岭南史地和民俗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 106.
- [5] 广州市芳村区文化局. 芳村名胜风物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8: 2.
- [6] 谢璋. 花地园林沧桑录 [M]// 广州市芳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岭南第一花乡.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3.
- [7] 谢璋. 花地名园百年沧桑 [M]// 广州市芳村区政协《芳村文史》编委会. 芳村文史 (第3辑).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91: 84-90.
- [8] 张维屏. 花埭 [M]// 张南山全集 3.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95: 212.
- [9]BALL D B L. Rambles in Eastern Asia: Including China and Manila, During Several Years' Residence[M]. Boston: James French and Company, 1855: 105.
- [10] 张维屏. 翠林园赏牡丹 [M]// 张南山全集 2.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19.
- [11] 张维屏. 花市 [M]// 张南山全集 3.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213.
- [12] 张维屏. 花市 [M]// 张南山全集 2.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424-425.
- [13] 谢兰生. 常惺惺斋日记 (外四种)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 [14]KERR J G. 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M].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1904: 18.
- [15] 彭长歆. 清末广州十三行商伍氏浩官造园史录 [J]. 中国园林, 2010, 26 (5) : 91-95.
- [16] 梁鼎芬. 民国版番禺县续志 (点注本) [M]. 丁仁长, 吴道镛, 等纂.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735.
- [17] 张维屏. 园中杂咏 [M]// 张南山全集 2.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503-504.
- [18] 彭长歆, 张欣. 从空间营造到文化生产——清末广州花地馥荫园再考 [J]. 风景园林, 2022, 29 (9) : 128-134.
- [19] 闵定庆. 节日狂欢氛围与花埭百花诗坛的共时性呈现——试论《花埭百花诗》的“狂欢化”写作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4) : 70-75.
- [20]ARTHUR A, WILLIAM B B, CHARLES B. A Manual of Natural History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M]. London: John Van Voorst, 1854: 656-662.
- [21]PETER OSBECK. 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s[M]. London: Benjamin White, 1771.
- [22] 王国良. 中国古劳月季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60-269.
- [23]JOHN L. Report upon the New or Rare Plants which have flowered in the Garden of 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 at Chiswick, from March 1824, to March 1825[J]. Transactions Of 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 1826, 6: 286-287.
- [24]JOHN L. Observations on the Difficulties which have exist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Plants from China to England, and suggestions for obviating them[J] Transactions of 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 1819, 3: 421-429.
- [25]ROBERT F.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M]. London: John Murray, 1857: 214-215.
- [26]LOUDON J C. Gardener' s Magazine 11[M]. London: A. Spottiswoode, 1835: 437-438.
- [27]JOHN L. Account of the Method of Dwarfing Trees and Shrubs, as practised by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eir Plan of Propagation from Branches[J]. Transactions of 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 1822, 4: 224-231.
- [28] 范发迪. 知识帝国: 清代在华的英国植物学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8.
- [29]IDA LAURA PFEIFFER. A Woman's Journey Round the World, From Vienna to Brazil, Chili, Tahiti, China, Hindostan, Persia, and Asia Minor[M]. London: N. Cooke, 1854.
- [30]OSMOND T J.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s emprise[M]. Boston and Cambridge: James Munroe and Company, 1849: 160.
- [31] EMIL V B.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1.

作者简介:

张欣/1997年生/女/河南周口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510641)/在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园林史、文化遗产保护

(*通信作者) 彭长歆/1968年生/男/湖南宜章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广州510641)/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岭南近代建筑史、园林史、文化遗产保护/E-mail: arcxpeng@scut.edu.cn